

识力横绝一世 守文不负初心

—— 民国“怪杰”吴秋辉的学术坚守与百年回响

■ 刘迎秋

清末民初,山河震荡,体制更革,风气日变,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思想文化领域亦随之而动,延续近两千年的传统学术体系濒临崩塌,新式学术范式尚在酝酿,中西学说碰撞、新旧思想交锋,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又乱象丛生的特殊学术时代。山东临清籍学者吴秋辉,便是这一时代中底层文人的典型代表。

吴秋辉(1877—1927)一生横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身兼新旧两学,在经史、小学、词赋等传统学术领域根基深厚,同时又在新式学堂研学多年。提倡不破不立,竭力跳出旧有学术的桎梏,以传世文献为根基,以金石文献为佐证、以方言民俗为参照、以西方逻辑为方法,构建起独树一帜的治学体系。梁启超曾给予其“识力横绝一世”的高度赞誉,鼓励他继续研究,以开创二千年学术大革命。

相较于同时代声名显赫的康有为、胡适、傅斯年、夏承焘等学界大家,吴秋辉生前僻居齐鲁一隅,终身清贫困顿,且毕生著述受时局影响,大部分长期尘封、未能刊行,导致其学术成就长久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后世知之者寥寥。直至近年,其后人历经数十年搜集整理,《佻僚轩文存》《佻僚轩说经》《吴秋辉遗稿》《吴秋辉遗稿补编》等珍贵典籍方陆续面世,这位被时代低估的临清籍学术“怪杰”,才逐渐重回大众视野,其独特的治学思想、深厚的家国情怀,得以被重新认知、深度挖掘。回望其治学人生,不仅是对一位本土先贤的追忆致敬,对清末民初学术转型脉络的梳理,更是对齐鲁国学传承文脉的赓续溯源。

一、佻僚一生:乱世布衣的坎坷沉浮与文人风骨

吴秋辉,本名桂华,字秋辉,晚年自号“佻僚生”,取自屈原《离骚》中“忼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之句。“佻僚”二字,喻指失意彷徨、怀才不遇,既是他对自身人生境遇的精准概括,也是其一生坎坷困顿、壮志难酬的真实写照。

清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十五日,吴秋辉生于山东临清考棚街一户小康之家。临清地处运河咽喉,明清以来商贸云集,文风昌盛,运河文化的包容底蕴与齐鲁儒风的厚重积淀,滋养了一方文脉,也为少年吴秋辉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文化根基。得益于家境殷实,吴秋辉自幼得以接受系统完备的传统私塾教育,他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年少时便显露出超凡的文学天赋,十余岁即以诗文闻名临清乡里。幼儿时生病致一目失明,使其养成了极强的自尊心,以及独立好强的性格,为日后突破传统学术桎梏埋下了伏笔。

吴秋辉自幼体质孱弱,常常卧病在家,其于功名并不甚热衷,未能专心备考,故止步贡生。时值甲午惨败,王朝上国的迷梦破碎,民族迎来空前危机,变法成为全国共识,破旧立新、实业救国、新学图强成为时代主流。吴秋辉在目睹山河破碎、国势衰微后深受触动,毅然辞去临清钞关书办工作,投身新式教育,立志以新学济世,以实业报国。

1901年,吴秋辉考入山东大学堂,系统研习数理等新式学科,开启了八年的新求学之路。求学期间,吴秋辉勤勉笃学,涉猎广泛,既深耕数理实业相关课程,潜心钻研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以实业技艺挽救国家危亡;又从未舍弃传统文史治学,课余博览经史、深耕古籍。文理兼修的学习经历,让他跳出了传统文人只读经史的狭隘格局,兼具传统国学底蕴与近代科学思辨思维,形成了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治学理念。

1909年,吴秋辉学有所成,凭借优异的综合成绩,成功考取自费赴日留学资格,本可借此机遇精进学识、开阔眼界,开启济世报国的全新人生。然而造化弄人,主管部门以其眼疾“有碍国际观瞻”的荒唐理由,直接取消留学资格。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其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如其《满江红》词中“十载学堂,只赢得空文一纸,更说甚马科知县,牙科进士。化电声光成弃物,积微元代徒为耳”,道尽了新学无用、壮志难酬的落寞与悲凉。自此以“佻僚生”为号,寄寓自己失意困顿、怀才不遇的人生境遇。

留学梦碎后,吴秋辉黯然返回临清故里,以教书育人、传道授业为业,深耕乡土、启迪后学。1912年,民国成立、政体更迭,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新式报刊蓬勃兴起,成为针砭时弊、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吴秋辉受邀再度奔赴济南,担任《山东齐民报》等多个报纸主笔。任职报界期间,吴秋辉直面社会乱象、痛陈时政弊端,文辞犀利,一时声名大振。

袁世凯帝梦破灭后不久离世,由此军阀割据、互相攻伐、时局日非,吴秋辉逐渐对时政心灰意冷,主动褪去报界锋芒,远离舆论纷争,终日以饮酒赋诗、品读古籍消解胸中山河之痛、人生之憾。这段时期,他潜心诗词创作,感怀时局、抒写心志,留存《佻僚轩诗词》两卷,收录大量咏怀、忧国、叹世之作,文字沉郁苍凉、意蕴厚重深沉,尽显乱世文人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悲慨。

1917年,是吴秋辉治学人生的重要分水岭。他开始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经史古籍研究,其学术著作基本为此十年所撰。1919年,他受邀奔赴北京,先后担任《民意报》《民主报》等报刊主编,在办报之余持续深耕学术,潜心钻研文字源流与经学要义,相继著成《说文溯源》《说诗解颐录》等重要著作,在古文学、诗词考据领域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1921年,吴秋辉为潜心治学,毅然离京返济,于大明湖南畔赁小楼一间,隔绝世俗纷扰、深耕古籍经典,全身心投入经学考据工作。1924年,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学界敬重其深厚学识,特邀其主讲经学;此后又受聘山东第一师范学校,主讲诗词文史课程。讲学期间,他学识渊博,不拘成说,见解新颖,论证扎实,在师生间引发强烈反响,一时声名鹊起,与栾调甫、张默生、解子义等学者相交甚笃。半生奔波、半生治学,终是天不假年。长期的清贫困顿、忧思郁结、伏案深耕,严重损耗了吴秋辉的身心。1927年5月28日,吴秋辉积劳成疾、郁郁而终,年五十一。

纵观其一生,少年聪慧而多病,青年立志而受挫,中年入世而失意,晚年治学而清贫。即便命运百般磋磨、人生满是遗憾,吴秋辉从未沉沦颓废、自暴自弃,反而将所有的悲愤、不甘、坚守与热爱,悉数倾注于学术研究之中。寒夜孤灯、风雨寒窗,他终日面壁研经、伏案著书,以“潇潇风雨夜生寒,面壁挑灯向夜阑。老作经生岂得已,要留巨眼与人看”的坚守,深耕古籍、突破旧说,在无人问津的清贫岁月里,执着探寻中华经学的本源真諦,坚守传统文化的精神根脉。

二、家国为怀:乱世文人的治学初心与文化担当

吴秋辉虽深居简出,但并非闭门造车、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其毕生治学、深耕经学的选择,不是单纯的个人志趣,而是根植于家国危亡、文脉存续的时代担当,饱含着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自觉。在西学东渐,传统文脉遭遇空前冲击的时代背景下,他以笔为剑、以学为盾,试图通过正本清源、重构经学,挽救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自信。

1900年起,国内文物盗卖出国之风盛行,敦煌文献等众多民族文化瑰宝惨遭掠夺。对此,求学期间的吴秋辉便初窥家国之大义,挺身而出,联合同窗学子上山东巡抚,痛陈文物盗卖之弊、文脉流失之痛。指出:“古物者,天地之菁华、国家之特色、祖宗之留遗,而进化之迹象也。其权利俱非个人之所得私有。个人无其所有之权利,则买者卖者皆当认为不法之行为。”恳请官府严查严惩盗卖文物之人,彻查文物走私乱象,完善保护机制。1909年,清廷民政部正式颁布《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足见吴秋辉的远见卓识,契合时代发展大势。

身处政局动荡、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的乱世,吴秋辉将家国命运、文脉存续置于首位。他目睹江山变色、国事日非,内心满是迷茫与悲痛,在《春望》一诗中写下“天地自春色,江山非故园。艰难双鬓改,丧乱一身存”的深沉慨叹,道尽乱世文人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

民国初年,外有列强侵袭、内有战乱纷争,身为报人、学者的吴秋辉,始终心系时局、情系苍生。1914年,日本侵占胶东半岛,战火蔓延、生灵涂炭,齐鲁大地惨遭蹂躏。吴秋辉悲愤难平,挥笔写下《哀潍东》:“城隅鱼龙入,郊原战伐新。村空唯有树,兵过更无人。异族相相恤,天心太不仁。年暮杜陵泪,东望一沾巾。”全诗沉郁悲怆,字字泣血,饱含对侵略者的愤慨、对流离百姓的悲悯、对家国沦陷的痛心,尽显传统文人的家国大义与悲悯情怀。

1926年,军阀张宗昌主持恢复山东大学,聘请前清状元元王寿彭主持校务,王寿彭推行旧式教育,提出“读圣贤书,做圣贤事”,以僵化经学禁锢学子思想。得知此事后,吴秋辉挺身而出,公开发文批评复古守旧的办学理念,亲自草拟新式教学提纲。王寿彭深知其学识威望,深夜登门拜访,试图以名利拉拢,恳请其停止发文批判。面对诱惑,吴秋辉勃然怒斥:“我凭借一知半解,愿为山东学子请

命,我并不是骂街的学棍,有意来敲诈。”言辞刚正、风骨凛然,尽显学者坚守正道的崇高气节。最终,固守旧学的王寿彭因师生强烈反对黯然辞职。

纵观吴秋辉的人生轨迹,其治学之路的选择,充满了偶然与必然的交织。年少时期的他,极度不喜传统经学,反感旧式经学“纠缠附会,说经而经反晦”的僵化弊端,认为其束缚思想、毫无新意。其转向经学研究的契机,源于一次偶然的古籍研读。1917年盛夏,吴秋辉偶阅元人所携《楚辞集注》,发现书中存在大量文字讹误,注解不通之处。他潜心推寻致误根源,终于洞悉《楚辞》本为古文成书,后世传抄讹误,注解偏差,导致经文晦涩难懂。若以古文视角重新解读,诸多千年未解的疑难文句便可豁然贯通。由此萌生了考订古籍、正本清源的想法。

让其更加坚定深耕传统经学则始于一次购书事件,1921年,吴秋辉在天津购得《印度遗事》一书,书中所载《吠陀》经典,成书年代、文体形制与中国《诗经》高度相近。但印度经典历经岁月变迁,战乱动荡,本土文字、经义已然失传,印度人只能远赴欧洲求教西方学者。由此,吴秋辉心中大骇,深恐中华千年经学重蹈印度文脉断绝的覆辙。为守护中华文脉、传承国学根脉,他下定决心潜心治经,纵使清贫潦倒,亦无怨无悔。

彼时的中国学界,新文化运动、古史辨运动风起云涌,疑古、破旧、反传统成为主流思潮。众多学者全盘否定传统经学,一味推崇西学,吴秋辉逆势而行、坚守本心,不盲从时代风潮,不随波逐流,既不固守传统旧说,也不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以理性思辨的态度审视经学,批判僵化附会的旧式治学,挖掘经学本源的文化精髓,致力于还原古籍真义、复兴正统经学、重塑文化自信。

为推动经学复兴、文脉传承,吴秋辉摒弃文人清高,放下世俗身段,多次奔走呼吁,上书建言。他在《上同乡诸大老请振兴经学书》中恳切陈情,呼吁乡贤名士捐资助力,振兴经学,让六经真义重现于世、惠及后世。在《上大总统请修明经学书》中,他极力阐释经学为“中国立国之根本,东洋文明之所自出”,恳请官方重视经学传承、拨款扶持国学发展。他曾自负坦言:“历来言经学者,其目的无一不在于经学之外。十之九为利,而其一则为名也。其超出于两者之外,而一以经为事者,三千年来,其惟予一人乎。”这份自负,并非狂妄自大,而是纯粹治学、无私为国的赤诚担当,是不为名利、只为文脉的纯粹坚守。

三、治学根基:词章涵养与小学深耕的双重积淀

张之洞曾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统称“小学”,是传统经学、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工具,更是解读古籍、辨析经义的核心钥匙。吴秋辉一生治学大成,绝非偶然,源于数十年循序渐进、层层夯实的学术积淀,早期的词章修养与中年的小学深耕,为其晚年经学、古史研究的突破创新,筑牢了坚实基础。其治学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早年专精词章、深耕诗学,中年深耕小学、打磨考据功底,晚年主攻经史、开创治学新境,三阶段层层递进、融会贯通。

词章之学是吴秋辉治学的起点,贯穿其一生治学始终。早年私塾求学阶段,他潜心研习诗词文赋,博览百家诗文,练就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与出众的文字感悟力。数十年间,他笔耕不辍,留存《寄傲轩吟稿》《佻僚轩诗词》等诗文集,收录诗词两百余首。其诗文创作随时代变迁、人生境遇迭代,文风意蕴层层升华,清晰映照出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局的交融轨迹。晚清末年,其生活尚且安稳,诗文多为山水风物、友朋唱和、四时感怀,文风清新雅致、恬淡自然,重在陶冶情操、抒发志趣;民国之后,山河动荡,生计艰辛,其诗文转而聚焦时局哀哀、民生疾苦,人生慨叹,字里行间满是家国之忧、身世之悲,意蕴厚重、情感深沉,兼具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这些诗词作品,不仅是吴秋辉个人情志的载体,更是研究其治学交游的重要一手资料。

深厚的文学素养,赋予了吴秋辉敏锐的文字感知力与丰富的人文底蕴,让他后续考据治学兼具严谨性与灵动性,避免了乾嘉考据学派烦琐僵化的弊端。而中年深耕的小学功底,更是其学术创新、突破旧说的核心支撑。清末民初,甲骨文大量出土,金石之学蓬勃兴起,古文字研究迎来全新发展机遇,为传统考据学注入全新活力。吴秋辉敏锐捕捉到时代学术潮流,深刻洞悉出土金石甲骨的学术价值,直言:“今

日地不爱宝,古器之发见者日多,其考订训释,亦渐精确。虽尚苦字少,然即此千数百字而善运用之,则精骑三千,未必不胜于羸卒十万。逆料数十年之后,古文学一派,必将郁为大国,起而夺汉学家之席而代之。”这番预判精准长远,充分彰显其超前的学术眼界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清代乾嘉学派以考据治学闻名,毕生推崇《说文解字》,将其奉为文字考据的主臬准则,后世学者多沿袭旧说、不敢质疑。吴秋辉深耕古文字研究,跳出清代考据学的固化框架,不盲从权威、不迷信典籍,以出土甲骨文为核心依据,结合文獻流变、语音演变、字义迭代,精准剖析《说文解字》的三大核心不足,打破学术桎梏。

其一,文字字形之误。古籍流传全靠手抄传抄,历经千年辗转誊写,世代更迭,字形讹变,笔画失真在所难免。东汉许慎编撰《说文解字》时,所能见到的古文献籍已然残缺失真、真伪混杂,多为后世传抄伪作、后人臆造,并非商周原始古文原貌。许慎依据失真字形解读文字本义、辨析字形源流,必然谬误丛生,牵强附会,后世学者沿袭其说,进一步固化文字讹误,曲解文字本源。其二,音韵流变之失。语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古今语音差异巨大、南北方音迥异,同一文字的读音、声调,随时代更迭、地域变迁不断演变。《说文解字》固化古音、拘泥旧说,忽略语音的动态演变规律,以静态古音解读动态流变的文字音韵,导致大量音韵考据失真失实,脱离本源。其三,训诂释义之弊。文字义随社会发展,文明迭代不断演变,古今字义、语境用法差异极大。《说文解字》固守古义,常以古义解读后世经文,易曲解经文本义,误导后世治学。

其古文字研究专著《说文溯源》专就《说文解字》之不足进行考辨,一经出版便引起学界关注。梁启超读后赞叹称“字字莫逆于心,欢喜踊跃,得未曾有”。古文字学家张政烺亦高度评价:“吴氏的著作,《说文溯源》《说文溯源续编》,我都买过读过,研究甲骨文字,颇有见解。时在民国初年,在甲骨文专业中是先进者,比叶玉森、商承祚等人还早。”这份评价,充分肯定了吴秋辉在近代甲骨文文字研究领域的开拓地位与学术价值。

深耕小学、精研文字音韵训诂,并非吴秋辉的治学终点,而是其通往经史研究、学术大成的必经之路。他以小学为治学工具、以考据为核心方法,夯实学术根基,打磨治学能力,最终跳出纯粹文字考据的狭隘范畴,将小学功底全面运用于先秦经学、上古史学的深度研究,实现了从文字考据到经史阐释的跨越升级,为其晚年学术大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学术大成:多维创新的治经体系与丰硕成果

在扎实的词章修养与深厚的小学功底支撑下,吴秋辉中年之后深耕经学、古史研究。相较于同时代学者,其治学最大的特色,在于打破门户之见、融合新旧方法、贯通古今文獻,综合运用先秦经学、上古史学的深度研究,实现了一套多维立体、求真务实的治经体系。

在1923年《再致康南海书》中,他完整总结自身治学五大核心方法,康有为读后亦称其“真好学深思之士也,于今世不可多得”。其一,本经互证、归纳演绎。研读经文,以本经文本为核心依据,以归纳法贯通义理,再以演绎法推演佐证,确保释义精准、逻辑自洽;其二,群书互证,拓宽视野。广泛涉猎先秦两汉诸子百家、史书典籍,以传世群书相互印证,弥补单一文本的局限缺陷;其三,以字释义、逐本溯源。从经世文多经传抄改写、字体迭代,不少已脱离古文原貌,不可拘泥后世文字形制解字,应立足文字本源释义;其四,方言佐证、借重语音。先秦六经文本,多诞生于北方中原核心区,部分文字语音、语义语境可通过现存中原方言方言佐证,还原上古文字语境与经文内涵;其五,实物考察、古今对照。上古部分名物制度、民俗礼制、社会形态,可通过后世实物遗存、民俗风貌溯源考证。并结合出土器物、民间民俗对照佐证,让经学考据言之有物、考之有据。

这套治学方法,极具时代创新性与学术前瞻性。清末民初,王国维提出“地下新材料+纸上旧文獻”的二重证据法,开创现代史学考据新范式。而吴秋辉的治学体系,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方言音韵、民俗实物、古今语汇,兼具文献考证、考古实证、民俗佐证、语言溯源等多重维度,已然初具后世杨向奎、徐中舒等提出的“三重证据法”的完整内核,充分彰显其超凡的学术眼界与创新能力。

依托这套成熟完备、求真务实的治学体系,吴秋辉在晚年数年间著述并喷、成果丰硕,撰写了一系列高质量经史考据著作,涵盖六经考证、古史辨析、诸子纠谬、名物训诂等诸多领域。其核心著作《佻僚轩说经》凡六十余万字,聚焦《诗经》考据,历历代注疏之讹、辨千年经义之谬,是民国时期《诗经》研究的力作。另一部巨著《学海明珠》原三十二卷,现存十六卷,是其第二部标志性专著,从文字字形、音韵流变、句读释义、名物制度、历史史实、方言民俗等多个维度全面考据《论语》《礼记》《周易》《左传》《尚书》等先秦儒家核心经典,内容翔实、见解独到。

除此之外,吴秋辉还著有《周易考略》《檀弓纠谬》《说易》《左传正讹》《论语发微》《仪礼今古文考异》《礼记正误》《诸经名物拾义》《古史钩沉》等经史考据著作,以及《读庄漫录》《杂考》《艺苑杂抄》等诸子杂考、读书札记,另有《说鬼》《破屋宾谈》等日记随笔、治学杂录,涉猎范围极广。其考据立足实证又敢于创新,《临清县志》亦盛赞其治学:“读书得闻无前人所未发,其谈名物训诂皆取证当前,绝不空疏……尤能凿险绳幽,时获创见。”刘又辛教授评价称:“其考据方法远胜清人,许多论点,今天读了仍有新灵感;有些考订,发前人所未发。六十余年前写成此等著作,实属不易。”

吴秋辉曾规划完整的六经考据体系,计划完成《诗经》后逐一完善其他五经的研究。张默生曾计划邀约吴秋辉赴青岛,助力其完成治学夙愿,却因遭军阀通缉、亡命海外而遗憾作罢。令人惋惜的是,天不假年,壮志未酬,他仅完成《诗经》核心考据,其余宏大构想尽数沦为腹稿,未能成书。对此,近代山东史学大家王献唐曾感慨:“近世山东治古文字者,黄县有丁佛言,临清有吴秋辉,皆早去世,遗著多未刊行。”

临终之际,吴秋辉捶床长叹:“吾以数十年之精力研讨古籍,今方彻底了悟,著述未及一半而病人膏肓,岂非命也!天之生我,果为何者!”这句临终慨叹,是一代学界奇才壮志未酬的无尽遗憾,也是乱世文人身不由己的时代悲歌。

五、文脉永续:百年回望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吴秋辉的一生,是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生动缩影,更是齐鲁文脉孕育出的精神标杆。他身处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乱世,不盲从潮流、不固守僵化,以纯粹的治学初心、严谨的考据精神、深厚的家国担当,在疑古弃古的时代坚守文脉,在西学盛行的时代深耕国学,在清贫困顿的时代笔耕不辍。他摒弃功利治学之心,不为名利,毕生治学只为正本清源、传承文脉。

其文字间时常流露的批判与慨叹,看似严苛偏激,实则是爱之深、责之切的家国赤诚。他痛陈国人治学盲从、人云亦云的积弊,厌恶学界唯权威是从、不思求证、敷衍附会的浮躁风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经学千年停滞的核心症结,不在于古籍经文本身晦涩难懂,而在于后世治学之人故步自封、穿凿附会,以僵化认知束缚经典本义,以功利之心曲解圣贤文脉。

受限于时代境遇与个人际遇,吴秋辉的学术影响力长期被遮蔽,未能彰显。究其根源,其一在于终身清贫,无力刊刻著作,百万字心血手稿尘封案牍,未能在生前形成系统学术影响力;其二在于壮年早逝、壮志未酬,核心治学构想尚未落地,学术体系未能完善;其三在于不涉官场、不逐虚名,无师门标榜,无门生弘扬。种种因素交织,让这位被梁启超誉为“识力横绝一世”的天才学者,沦为近代学术史上的“隐者”,长久湮没于岁月尘埃之中。

所幸文脉不息、薪火有传。经由吴氏后人数十年接续守护、整理校勘,吴秋辉的遗著陆续刊行、重见天日,散落百年的学术碎片得以重新拼接、完整复原。后世学者得以跨越百年时光,重读其文,深究其学、体悟其心,让这位乱世布衣学者的学术思想、治学精神、家国情怀再度焕发时代光彩。

运河汤汤、文脉绵绵,先贤虽逝,风骨长存。吴秋辉的一生,是坎坷困顿的布衣一生,更是笃志深耕的学术一生。他生于乱世,困于时局,却忠于文脉、不负初心;身处陋巷、清贫终身,却胸藏山河、心怀家国。百年之后,重读佻僚遗文,回望先贤风骨,依旧能感受到穿透岁月的学术力量与精神温度。这位被时代低估的临清奇才,终将凭借不朽的学术成果与厚重的精神品格,镌刻于齐鲁文脉史册,光照后人。

